宋儒书信中的思想交锋

南京大学文学院    刘沅祁

谈起蔡襄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中国书法史之“宋四家”。其实蔡襄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。他忠谏直言，为宋仁宗所重用，政绩斐然。《答谢景山书》是蔡襄在京师任职时与友人谢景山交流、探讨思想的实例。他与友人辩论文道关系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宋代儒士切磋论辩的图景。深入此“书”，我们不仅能欣赏古人信札之美，更能窥见宋儒对“文以载道”观的解读与发扬，了解北宋思想环境的一个切面。

/ 原文1/襄顿首景山足下：夏中辱示新文数十篇，其间景山所称道而仆所不愿为者，因事往问，幸而时中，欲景山思而从之，不敢陈于文辞也。

/ 译文/ 蔡襄拜见谢景山先生：今年夏天，你屈尊向我展示了几十篇新作的文章，其中你所称道而我却不愿做的，我通过其他事探寻这些问题，幸运的是偶能切中关键，很希望景山你能有所思考并听从我的话，但不敢用文章来表达。

文史补给站

古代书信之美

中国古代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书信文化，“谦”和“敬”是其中的重要部分，即便是关系亲密的朋友，在书信中也时刻保持着自谦和尊敬的态度，而这首先便体现在用语方面。例如，写信人多以名自称（如蔡襄自称“襄”），而呼对方以字（如称谢伯初的字“景山”），不失敬重也不乏亲切。而写信人自称时常常使用谦辞，如“仆”“愚”“区区”等，称对方时用尊称，如“足下”“仁兄”“吾子”“阁下”等。即便是言辞激烈的书信，如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也是通篇以“足下”相称，对收信人绝不失基本的恭敬。

书信的始末也有讲究。开头处，写信人常常要写“顿首”“再拜”“稽首”等，这是动作性的礼节，与古代人们见面的礼仪传统一脉相承。另外，在提及对方的某种行为时，常在前面加上“垂”“枉”“辱”“惠”等词，而提及自己的行为时则加上“窃”“私”“奉”“不敢”等词。信中的敬辞和祝福也有定例：如信开头写“某某钧鉴”“某某尊前”；在信末则常为对方祈福，按时令有“春祺”“夏祉”“秋安”“冬绥”等，按对方的身份或行为有“吟安”“学安”“文祺”“旅安”等，不一而足。总之，文士之间的交流，一切都要体现《易经》所谓“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”的品格。

以上所举多是书信中的套语，然而书信更重要的是行文本身，诸如思路、措辞、语调，等等。这些内容，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理念和修养，需要我们细读、体察。书信用语背后，蕴含的是温良谦恭的儒家传统，是中国古代士人交流之礼，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与人情伦理的体现。

/ 原文2/某谓由道而学文，道至焉，文亦至焉；由文而之道，困于道者多矣。是故道为文之本，文为道之用。

/ 译文/我认为，由学道而学文章，道如果达成了，文章也就学成了；由文辞而学道，就会对道本身产生很多困惑。因此，道是文的本源，文是道的用途。

文史补给站

宋代的“文”“道”之辩

蔡襄写信给谢景山，主要讨论了“文”和“道”之间的关系。蔡襄在信中说：“道为文之本，文为道之用。”他认为，文与道的关系是先道而后文，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明道。但他并不是首位持此观点的人。“文”与“道”一直是中国文学史、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。南朝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明确提出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以明道”的观点，也就是“文从道出”与“因文明道”。唐代则有韩愈所称“修其辞以明其道”、柳宗元所谓“文者以明道”，都深刻影响了后人。北宋初期，柳开、王禹偁等一批士人深思务实，继承了韩柳等人发起的“古文运动”中质朴、平实的精神。但日久承平，宋初，靡丽空泛的“西昆体”一度成风，文坛亦为之所蔽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北宋中期，儒学复兴与政治革新相继而兴。仁宗朝推行“庆历新政”，文学也开始自我更新，文士们再一次重视起文学的现实性与责任担当。石介、范仲淹等人从政治实用角度出发，提倡“复古明道”和“道统即文统”之说。而欧阳修则把“言之有物”和“言之有道”沟通起来，提出“文道并重”的要求，反对空头文学家。他说：“诗之作也，触事感物，文之以言，善者美之，恶者刺之，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，道其哀乐喜怒于心，此诗人之意也。”而蔡襄这封信中，既有“道本文用”的观念，也有“文道并重”的理想。谢景山喜爱韩愈、杜甫的文笔，也就是蔡襄所说的“由文而之道”，在蔡襄看来是不妥的。